

美国的思想库及对中国的借鉴

The US Think Tank and Its Enlightenment

薛 澜*

(清华大学 21 世纪发展研究院, 博士、研究员

北京 100084)

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Dickson, 1971)。思想库在确定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提出建议等方面有很高的自由度。在当今美国社会里,思想库既是科学知识及制定政策之间的重要桥梁,又是专业知识库及高级人才库。

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

要想知道美国的思想库是怎样影响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了解美国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公共政策的实质是有关政府行为模式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被用来指导政府的日常决策。例如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包括确定哪些国家是美国的友好国家、哪些是敌对国家,美国怎样对军事威胁作出反应,美国应当对哪些国家提供哪一类的经济援助等等。美国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与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Edwards, 1988; Lynn Jr., 1987; Kingdon, 1984):

1. 提上议程

美国政府需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要想使某个问题得到重视,被提上议程,并非易事,这里面既有实际情况的需要,也有政治的因素。美国 60 年代“向贫穷宣战计划”的提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63 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举国震惊,很多人有一种“国家向何处去”的茫然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任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在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就约见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勒(Walter Heller)谈经济形势。赫勒本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美国的贫穷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并且也曾多次向肯尼迪提出过。但当时肯尼迪更关心的是怎样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反贫穷问题还提不上日程。这次赫勒抓住机会,又向约翰逊总统提出建议,组织反

贫穷运动。约翰逊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这样一个计划有可能使美国人民和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在他的周围,使他能够树立威信。为此,他责成赫勒全力以赴,组织研究具体政策和实施计划。赫勒很快组织了一批队伍,提出了以“社区行动计划”为核心的实施方案。1964 年约翰逊遂在其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向贫穷宣战的计划(Smith, 1992)

2. 形成政策

一旦某个问题被列入日程,下一步就是形成政策建议,这里又涉及到很多具体步骤。首先有关部门或人士要收集各种相关的资料及信息,并将其送到有关分析专家及决策者的手中,然后形成若干不同的政策建议,由支持和反对这些具体建议的人和利益团体在决策者面前陈述各自的观点。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国会举办的各种公开听证会。最后由决策者选择最佳方案。根据宪法的规定,有很多重大问题,总统个人还不能说了算,必须由国会投票通过使其“合法化”。政策的形成过程可能是决策程序中最为复杂的一个环节。也是最能体现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影响的一个环节。同时,各个利益集团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使出浑身解数,争取使最后的政策符合本集团的利益。

3. 执行政策

一个政策建议一旦得到合法化,就进入了执行阶段。很多政策由于涉及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往往需要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必要时,须成立部门间的协调委员会。涉及外交政策问题,往往还需进行国家间的协调。同时,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还会出现很多争议,如对政策的不同解释,各有关部门的权限分配等等。因此,一个政策的执行往往还需要有人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进行仲裁。

4. 政策评估

一个政策得以进入执行并非意味着政策过程的结束,还必须对该政策执行情况监控、评估,看看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需要做哪些调整。这

* 兼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管理学及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里,美国总审计室(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简称GAO)的作用不可不提。GAO是国会下面的一个服务机构,主要作用是监督及评估政府部门的运作及政策执行情况,每年GAO要发表数以千计的监督及评估报告,为国会对政策的调整提出依据。

参与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机构与个人

1. 参与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机构

参与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机构包括政府的行政部门及国会,国家的研究咨询机构,各种思想库及利益集团。

由美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可能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如果所涉及的政策问题在内阁的权限之内,则政府的行政部门就可以出面组织制定政策,最后由总统拍板(其中有可能会涉及到与国会有关委员会的协调)。如果涉及到的政策问题需要立法,那么国会中相关委员会就变成了政策制定的中心,当然国会也需要同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以保证政策确定后的顺利执行。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同时又互相制约。很多大的政策问题,在总统作出决定之后,如果国会不满,仍可以进行辩论以至否决总统的决定。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克林顿总统已经明确宣布无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可国会仍要举行听证会和辩论会,公开向克林顿总统的决定作出挑战。但是总统对国会通过的议案有否决权。除非国会有压倒多数(2/3的票数以上),否则总统还是可以定夺的。

国家的研究咨询机构和各种思想库在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它们的分工又有所不同。国家的研究咨询机构包括隶属于总统或政府各部门的研究机构以及隶属于国会的研究咨询机构。例如,属于总统的有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白宫预算与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等等。属于国会的有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前不久刚刚被撤消)等等。这些国家研究咨询机构一般不去从事第一手的研究,它们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综合分析现有的高水平的研究结果,根据总统或国会的需求,提出各种政策建议,并分析预期结果。有的机构,如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则主要是组织某一领域内的专家与该机构的研究人员一起合作进行研究。与此相对应,各种思想库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其长

期深入研究的结果来实现的。对此,本文随后还将详细讨论,这里不再赘言。

各种利益集团是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另一股力量。这些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例如,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就是代表美国科学界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组织。每年四月份在美国下一年度财政预算进入讨论期时,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就要在华盛顿召开一年一度的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邀请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相关的科技预算进行说明。与会的美国科技界有影响的各方代表则对这些预算评头品足,施加影响。会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总要把自己对政府科技预算的分析及与会者的评论结果出版,进一步扩大影响(AAAS,1995)。

2. 参与美国政策制定的个人

按照史密斯(Smith)的分析,参与制定美国政策的个人可以被分成以下几类(Smith,1992):

(1)学者—国务政治家(Scholar-statesmen)

这类人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不但学识渊博,在学术界享有盛名,而且还曾在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位。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克林顿内阁中的劳工部长瑞什(Robert Reich)都属此类,他俩都是著作等身之辈,都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多年,然后又到政坛施展身手。

(2)政策研究专家(Policy specialists)

这类专家与前一类相比更偏重学术,一般都没有直接从政的经验,但他们多年在某一政策领域的深入研究,足以博得人们的尊重。

(3)政策咨询专家(Policy consultants)

这类专家虽然没有以上两类人的名气大,他们在政策研究方面却是骨干力量。兰德公司(RAND)、斯坦福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等著名思想库中的政策分析专家都属于这一类型。

(4)政府运作专家(Government experts)

这类专家近年来逐渐增加,他们大多是政府机构中的中层官员。但与一般的政府官员不同,他们大多都在如国会预算办公室中的国家研究咨询机构中工作过,他们不单对政府机构的运作极为了解,而且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十分娴熟。

(5)政策评论专家(Media professors 或 spin doctors)

这类专家大多数是电视台的公共政策评论专家、论坛主持人、主要报纸的评论员等等,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许不很丰富,但他们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对公共政策的形成也起着很大的影响。

(6)政策创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

这类人虽然本身也可能从事过政策分析,起到过以上各类专家的作用,但他们最主要的活动集中在建立政策分析机构或创办相关出版物。很多著名

思想库的创办人或执行主任都属于这一类型。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圈子外默默无闻,但其工作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所提到的这几类政策专家流动性很大,他们有的在多年从事学术研究后,进入政府。有的人则在从政之后,加入研究机构,专心学问。而许多著名的思想库则是这些人最中意的隐身之地,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就吸引了不少前共和党政府的高级官员。

专家参与决策及思想库发展的历史进程

美国思想库的发展是专家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本世纪初,这时专家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方式是非正式的,总统常常根据需要,临时召集专家进行咨询。最为有名的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所组织的一个代号为“探索”(The Inquiry)的咨询计划。该计划从全国各地召集了150名专家,在纽约悄悄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要召开的和平会议作准备。这其中的很多专家陪同总统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和平会议。他们所作的政策研究为美国在此次会议上争取有利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任务一旦完成,这些专家们又都回复自己原来的工作(Smith,1992)。

随着美国政府在社会活动中作用的日益增强,总统对专家咨询的需要也越来越大,以前的那种非正式的方式已不能满足需求,这时,各种专家委员会或专家顾问组就应运而生了。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所喜爱的方式是根据政策需要设立专家委员会。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在竞选时就成立了主要由三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又称“Brain Trust”)为他出主意、起草政策文件等等。上任后,罗斯福又雇用了大批社会科学家为各政府部门服务。

“二战”后,专家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进入了第三阶段。首先,一些国家的政策咨询机构开始正式建立。杜鲁门总统(Harry Truman)建立了如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等机构,政府部门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政策咨询机构。同时,相对独立的各种思想库也开始大大发展。1948年兰德公司的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思想库时代的开始。到1970年,美国的非官方思想库增加到600家,目前已达上千家(Dickson,1971;Smith,1992)。

思想库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有深刻的历史及现实原因。进入本世纪后,美国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罗斯福的新政之后,政府

的功能大大增强,覆盖面更加广泛。诸多的政策问题涉及很深的专业知识,必须依靠专家的力量。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诸方面发展,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仅靠单个或少数专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上美国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利益集团多如牛毛,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更使公共政策分析的难度加大。以里根竞选总统为例,当时里根聘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作为竞选班子的政策协调人。安德森组织了25个内政及经济问题研究组、23个外交及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组,为里根出谋划策,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提出了为大多数选民所接受的建议,为里根的大胜奠定了基础。当时安德森动用的各方面高级专家竟达到450人(Smith 1992)。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连续性及可重复性要求有稳定的研究机构去从事专门研究,很多政策建议往往需要经过不断的讨论、修正,才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变成具体可行的政策行为。例如,从1990年起美国在环境保护措施中有一个新办法,即允许烧煤的电厂有一“排放定额”。这个定额如果用不完的话,可以出售给其它电厂,也可以“出售”给国家(如以国家降低污染税等方式)。这个办法的实施,促使很多的电厂通过各种方法,减少排放,既保证了环境质量,也降低了环保成本。这个方法在60年代,就已由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 For the Future)的学者提出。但当时,环境保护主义者竭力反对,认为这样会把环境污染合法化、合理化。经过近30年的不断研究、修改,到布什总统上任时这项政策建议已十分完善,反对者的声音也不那么强了,因此很快得到采用(RFF, 1996)。

综上所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思想库作为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在汇集专家的智慧力量对重大的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的持久的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其它任何机构也代替不了的。

美国思想库发展的特点

美国的思想库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高智力群体,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越美国的国界。中国许多从事软科学研究的学者对美国一些比较著名的思想库,如兰德公司(RAND)、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斯坦福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等等,都十分了解。因此,以下的讨论将把重点放在归纳和总结这些思想库发展的特点上。

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思想库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其次是思想

库内部的组织与管理。

1. 思想库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竞争、透明、名牌

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思想市场”也十分发达。首先，这个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这种竞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费的竞争，如前所述，美国的思想库超过千家，这里面绝大多数思想库的运行及研究经费需要“自筹”，即向私人或基金会募捐、向研究项目投标，或出售出版物或其它形式的研究结果。即使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以财源稳定而著称的思想库也不能例外。布鲁金斯学会的基金将近1亿美元，每年预算在1600万美元左右。基金会所提供的财路略超过预算的1/4。出售出版物及组织会议的收入接近预算的1/3。其余的就要到社会上去争取(Smith, 1992;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竞争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各种观点和学派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很大的程度上归结为关于公共政策的书籍和出版物之间的竞争。进入90年代，美国每年有6万册新书出版，其中超过6000册是有关经济及社会学的。据80年代中期的一个统计，25个最大的政策研究机构每年要出版250册新书及1000多种报告、论文集、会议文献等等(Smith, 1992)。在时间宝贵的现代社会里，很少有人能够去认真阅读这些出版物。只有那些高水平的、有新意的或争议较大的文章或著作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种激烈的竞争使得不同的观点和学派以种种方式互相碰撞，优者生存，劣者淘汰。最后存留下来的观点和建议比较成熟完善，使领导者可以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作出决策。这种激烈的竞争同时也迫使各个思想库对其“产品”质量高度重视。很多思想库动辄就要花费平均每本10多万美元或更多的经费去支持其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和写作。

美国的“思想市场”的第二个特点是透明度高。透明度是保证公平合理竞争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也可以使研究结果及时向社会各个阶层传播，从而多方面地影响政策的形成和执行。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机密的研究报告之外，各个思想库的研究报告和书籍都可以从书店或该思想库直接买到。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985年当美国众议院议长奥涅尔(Tip O'Neill)访问苏联时，戈尔巴乔夫拿着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斯坦福大学内的一个著名思想库)出版的一本题为《80年代的美国》的书向奥涅尔抱怨说，“我们已经读了胡佛研究所的这本书，发现里根总统对书中的右派观点全盘采纳”。奥涅尔一时不知所措，无以对答。出来后，他向助手撒气说：“天晓得这个胡佛研究所是干什么的。”原来奥涅尔这个老政客自己平时从不读具体的政策研究，全靠助手汇报，所以连胡佛研究所都不知道，而由于美

国思想市场的公开性，胡佛研究所的报告在出版后很快就被送到戈尔巴乔夫手中(Smith, 1992)。

美国“思想市场”的第三个特点是名牌突出。由于多年的发展，美国的思想库大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阵地。很多著名的思想库在研究观点、方法，及出版物等方面都有“名牌”。例如，兰德公司在国防战略系统方面的研究可以独霸一方；未来资源研究所又以效益—成本分析及风险分析方法见长；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出版的“世界现状(State of the World)”则是脍炙人口，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必读物了，每年卖出高达20多万册，这在政策研究的出版物中是罕见的。

2. 美国思想库内部的组织与管理：高效、流动、超前、广角

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的思想库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高效、流动、超前、广角。

高效指的是思想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作为出思想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恐怕是思想库最为宝贵的资源了。因此各主要思想库在人员的结构上都反映了这一观念。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会有81名专职研究人员，但这些研究人员的秘书、助手和其它辅助人员就有155人。胡佛研究所的80名研究人员也有200多人辅助配合(含胡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此外，思想库的组织及管理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例如，在兰德公司内部就存在着不同的组织管理形式。其“空军项目(Project Air Force)”研究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由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中心(FFRDC)，交由兰德公司代为管理，而其国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及其它几个与国防有关的研究部门则主要按研究承包商的方式从国防部拿钱按合同提供研究服务。另一方面，兰德公司的非国防研究部又完全按照盈利的咨询公司运作，每一研究人员都要写大量研究建议书从外面争取研究经费。这些灵活的组织及管理方式，使兰德公司在其所选择的领域内能够高效运作，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流动指的是各主要思想库与大学及政府机构之间的人员和思想交流十分密切。很多研究人员在大学工作若干年后加盟思想库，而很多新上任的总统又愿意到自己所倾心的思想库挑选人才。另一方面，很多卸任的官员又常到思想库从事研究，还有不少研究人员又从思想库流到大学(有些思想库本身就存在于大学之中)。例如中美关系问题研究专家哈定(Harry Harding)就是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多年后到布鲁金斯学会主持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两年前又应聘到乔治·华盛顿大学任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再如许多科技政策界人士所熟悉的希尔

(Chris Hill),原来在美国参议院担任科技委员会的首席助理,后来又加盟新成立不久的思想库——关键技术研究所(Critical Technology Institute)。前不久他又再次换位,到华盛顿附近的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任教。这种频繁密切的人员流动,促进了思想库与政府部门和大学的思想交流,使得思想库的研究人员一方面能够不断地吸取大学中的新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又能及时了解政府对政策研究的新需求。

超前指的是美国的思想库除了研究比较紧迫的政策问题,还从事政策科学方面一些比较基础的,有潜在意义但无现实需要的研究,为将来的政策研究进行思想储备。一旦有需求,马上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出政策建议。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里根1980年当选总统之后所抛出的题为“受命领导(Mandate for Leadership)”的报告就是超前研究的结果。里根当选之后,正当大多数保守派人士在弹冠相庆,自由派人士在痛定思过之时,传统基金会的总裁向里根的接班工作组的负责人交出了这份长达上千页的报告,为里根上任后怎样彻底贯彻保守派思想的精髓,改变卡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详细的方案。此举震惊了全美政界及各主要思想库,记者们争相报道,在一段时间内,这份报告居然成了华盛顿最畅销的书了。有的记者评论说这份报告简直就是一份联邦政府的实用手册。这份报告的出笼实际上是在传统基金会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由250名专家、学者,及保守派的思想家经过一年的综合整理,才炮制成功的(Smith,1992)。

广角指的是美国思想库研究方向的拓宽。许多思想库在成立之初主要偏重于某一领域的政策研究,如兰德公司偏重国防,美国企业研究所偏重经济等等。随着这些思想库的不断成熟,很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如兰德公司现在也从从事国内政策研究,而美国企业研究所也将其研究领域扩展到随经济以外的外交及防务政策等。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思想库满足思想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利用思想库人才经济的优势促进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对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分析及建议

近年来,我国政策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十分迅速。根据全国软科学调查统计分析课题组所提供的数据,到1994年底,全国从事软科学的研究机构已达1076个,从事软科学活动人员的数目已接近3万。1993—1994年度课题6000多项(全国软科学调查统计分析课题组,1996)。这些数字表明我国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政策科学研究队伍,有能力为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决策科学化的保障。

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政策科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依然过低,研究结果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研究结果的总体分析水平有下降趋势(全国软科学调查统计分析课题组,1996)。与时代对软科学队伍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末,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的政策研究体系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当尽快地完善我国的思想市场,为我国的软科学机构提供良好的环境,使我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涌现出一大批象兰德公司那样著名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库。以下笔者想结合“特区不特”的争论,谈一些具体的看法(关于“特区不特”争论的前后,请参见赵一宁,1995;胡鞍刚,1995)。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建立思想市场的重要性。我国目前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其复杂程度和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很多重大的公共政策必然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同的政策选择对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大不相同,万全其美的政策是绝无可能的。如特区政策问题就影响到特区与其它地区的经济利益分配。因此对于任何重大的政策问题,总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十分正常的。思想市场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之下,按照一套比较规范的方式,对重大的政策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使各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都在这个市场上接受碰撞,经受考验,优者生存,劣者淘汰。经过这种严格筛选后,我们的决策者就可以避开枝节问题的纠缠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去进行抉择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去年有关“特区不特”的公开争论与过去那种众口一致的局面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次我们应当开辟各种各样的渠道,使得不同的思想和观点能够进入市场接受挑战,接受考验。这些渠道应尽可能是透明的、公平的。透明是指这些渠道应当能够尽可能地向公众开放,而不只是局限于学者或其它特定的圈子里,从而使某一政策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有机会了解该政策的利弊。公平是指这些渠道应当向所有“言之有物”的观点开放。在关于“特区不特”的争论中,深圳一方的观点主要通过《深圳特区报》等国内报刊来发表,而另一方的观点在国内难以发表,只能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境外的报纸传播。这种只有一面之词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思想市场公平透明的原则的,现在我国已经有不少高水平的政策科学期刊了,希望今后这些期刊能够成为这些政策讨论的主要渠道。

此外,我们应当培养一种良好的风气。在“思想市场”上平等争论,以理服人,而绝不能轻易地把对

(下转第17页)

七、目的性

迪昂十分强调科学进化的目的性,认为不能轻视显示出有目的的发展进化理论,并且认为目的超越了物质的存在。按照迪昂的观点,“历史的目标对人类来说是共同的意识的实现”,“科学不知道自发的生殖”。迪昂通过对静力学的考察指出,众多的个体劳动者艰辛、曲折的劳作,最终完成了科学的宏伟大厦,可是每个人并不知道整体计划,即便这个计划预先处在设计者的头脑中,他也没有能力指挥和协调所有砖石工的劳动。尽管迪昂相信科学的进化充满了足够的逻辑,而没有陷入盲目、机遇的魔法设置的陷阱,但是面对这一背后潜藏有明确目的的神秘现象,类似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在迪昂的内心深处却油然而生:“静力学的进化甚至比生物的生长更多地受到指导思想的影响。在其进化的复杂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神性的智慧——他预见到科学必须朝向的理想形式——的连续作用,我们能够感到促使所有思想者汇聚到这个目标的努力的神力。一言以蔽之,我们在这里辨认出天公的作用。”

八、有机性

迪昂认为科学的进步不是机械的发展,而是有机的进化;不仅仅是简单的量的增长(观察材料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质的生成和变化——形成一个有结构的、有层次的、有机的理论体系。迪昂把科学史视为地球上的生命史——灭绝的理论在数量上超过幸存者;并多次指出观念和真理是有机地发展着,对此他经常用种子长成开花结果的大树、毛虫变成漂亮的蝴蝶之类的隐喻加以描绘。他还明确讲过:“伽利略和托里拆利原理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连续性的显著例子,科学观念通常是连续地发展的。我们能够追溯这种发展,就象博物学家追随有机体的发展一样。”

九、无穷性

迪昂把罗吉尔·培根的名言作为他的工作的箴言:“任何科学从来也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被

发明出来的,从一开始,知识就缓慢地成长,在当代它还不完备。”作为一个看到科学进化是如此迂回曲折和踌躇犹豫的历史学家,迪昂清醒地意识到大量的改善能够添加到任何无论多么完美的工作中。他把进化描述为真正的成长,这样的成长必然是无尽头的,包括他认作完美理论的能量学也是如此。他说:“恰当地讲,力学的发展是进化,这种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它之前的阶段的自然结果,是随它之后的阶段的主要部分。预先设想他为之工作而达到的体系将逃脱在它之前的体系的共同命运,并将值得比它们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也许是一种十分自以为是的想法。”

十、世界性

迪昂指出,就其实质而言,考虑到科学的完善形式,科学应该是绝对非个人的、非国家的;科学杰作和科学天才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科学的国家特征只不过是一种与科学的完善类型相背离的东西,它标志着与理想形式的距离。迪昂坚决主张,科学进化而达到的完善形式必定是国际性的:“在工作中隶属于种族和环境影响的東西是一种突出的缺点,这种缺点具有个人的偏见和共同无知的性质;相反地,摆脱这种影响则标志这项工作是真正独创的。”

科学活动是社会实践,而不是个人游戏;科学理论是对世界的近似描述和分类,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想象和虚构。因此,科学进步的大方向是由外部的客观实在和科学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决定的。即使人们一时对大方向的看法不尽完全一致,但是科学实践和科学的历史无论如何都会使他们共同承认某种发展结果。然而在对科学进步的历史过程的诠释上,科学革命说和科学进化说的支持者均大有人在。歧见不用说与对革命和进化二者的意义的理解有关,而争论想必也不会有什么最后的定论。不管怎样,对科学的进化认识论的诠释还是吸引了许多科学哲学家,连主张“不断革命论”的波普尔也不例外。因此,迪昂关于科学进化及其特征的观点不仅构成了迪昂科学史观和编史学纲领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或多或少地溶进了当代的科学哲学文献之中,留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一点。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上接第22页)

政策问题的严肃讨论意识形态化。据《瞭望》周刊记者报道,有的争论文章言词激烈,连“学风差、品格差”的典型学棍的提法也见诸报端(赵一宁,1995)”。这种超出学术争论的做法与一个公平透明的“思想市场”所倡导的风气是大相径庭的。

我国的改革为政策科学研究者提出了一堆难题,这些难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思想市场的不断完善,在改革的大势中一定可以造就出一批高水平的中国思想库!

(责任编辑 蔡德诚)